

The Suffering of Mekarang:
The Memories of Resistance of the Defense Lines of
Frontier Guards and the Cherry Blossom Forest of
the Neihengping Mountain

Shu-Chin LIU LIU

梅嘎滾社的苦難：
櫻花林下的內橫屏山隘勇線抵抗記憶

劉柳書琴*

*劉柳書琴，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
聯絡方式：wakenlily@faculty.hss.nthu.edu.tw。

投稿日期：2021年8月5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12月10日。

摘要

在原住民社區發展的進程中，集體記憶的重構是社區意識凝聚和地方創生的基礎，也是去殖民和族群精神統整的重要過程。本文關切110多年前尖石前山泰雅族被掃蕩的歷史與記憶。面對這個議題時，歷史文本分析法有助於解讀新竹廳泰雅族討伐新聞，分析隘勇線前進政策如何對部落鎮壓、分化、招撫；記憶政治理論，則有助於了解同化政策施行後，地景改造為何能淡化衝突記憶，引導族人逐漸適應山地國家化的現實。分析步驟包括：第一，梳理官方打造的蕃地勝景「內橫屏觀櫻」出現的背景與過程。第二，檢視吉野臺（櫻山）櫻花符號的意義賦予與擴散過程，亦即官廳以勝景旅行解構血染之地的記憶政治操作。第三，脈絡化《臺灣日日新報》的討伐記事，從被討伐者的逆向視野，勾勒梅嘎蒞等社的應變身影。第四，分析1917年以後，在梅嘎蒞警戒區內形成的多族群社區，以及梅嘎蒞社人與官方認同的分歧。第五，探尋2000年以後梅花村人破碎的隘勇線反抗記憶及其當代意涵。

關鍵詞：梅嘎蒞、內橫屏山、尖石鄉、理蕃政策、臺灣日日新報、櫻花、地景、集體記憶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maintaining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lso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the progress of decolon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spirit.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mopped-up histories and memories of the Atayal people in the front mountain of Jianshi, Hsinchu, more than 110 years ago. In face of this issue, historical textual analysis help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s regarding the assault of the Atayal people in Hsinchu reported by *Taiwan Daily News*. It shows how the policy of the Japanese police guard-line suppressed, differentiated and offered amnesty for the tribe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s of memories informs us why landscape renovation was able to lighten up memories of struggles and guided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gradually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realities of colonization—the mountains were nationalized and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had start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se aspects in the following steps: First, it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officially established tourist attraction “cherry blossoms of the Neihengping Mountain.” Second, this paper scrutinize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meaning of the cherry blossoms in the Cherry Blossom Mountain was given and spread. That is, it explores how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deconstructed the memories of the bloodshed region by recreating a tourist attraction in it. Third, it contextualizes the news coverage of the assault in *Taiwan Daily News* and collects the responses of Mekarang and other tribes to offer a counter perspective. Fourth, it analyzes the identification divergence between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formed in Mekarang alert area, the people in Mekarang tribes and the officials after 1917. Fifth, it investigates the fragmented memories of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olice guard-line by the locals in Meihua Villag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Keywords: Mekarang, Neihengping Mountain, Jianshi, Aborigine Control Policy, *Taiwan Daily News*, cherry blossoms, landscape, collective memory

一、前言

在原住民族社區發展的進程中，集體記憶的重構是社區意識凝聚和地方創生的基礎，也是去殖民和族群精神統整的重要過程。

本文關切110多年前尖石前山的重大歷史事件。新竹縣尖石鄉，以標高1,914公尺的李嶼山為始，向西與字老山、東穗山、油羅山等群峰形成前山與後山的分水嶺。尖石前山，¹包含今尖石鄉北緣和西緣的前山地帶，自清中葉以來就是泰雅族、賽夏族、道卡斯族與客家人等的接壤地。原漢多個族群，以頭前溪兩大支流以及海拔一千公尺上下的一群中級山形成疆界，各踞一方，又縱錯往來，形成環山第一線的多族群畛域。然而在1895年臺灣割讓到1915年「理蕃政策」結束前的二十年，這塊前沿之地因為武力討伐與同化治理捲動的社會轉型，暫息了原漢多角互動，形成以泰雅族與日本人對應為主要的結構。

本文聚焦梅嘎蒨四社的梅嘎蒨群，²在山地國家化過程中的回應行動，以及當今梅花村居民對此事的集體記憶。梅嘎蒨四社，包括梅嘎蒨社及其周邊三社，屬於泰雅族，其分布地在日據時期被稱為Mekarang（メカラン），如今已繁衍為梅花村的梅達拜等六個部落。³梅嘎蒨社（今梅花村）在20世紀初期，其北方為麥樹仁社，東北方為野馬敢社，西南方為梅后蔓社。梅后蔓社與梅嘎蒨社都是梅嘎蒨群，又與麥樹仁社同屬加拉排系統。三社在舊砲臺隘

-
- 1 從油羅溪源頭，沿六畜山、拉號山、尖石山、加拉排山、麥樹仁山、外橫屏山、向天湖山、內橫屏山、油羅山，迤邐到上坪溪流域。
 - 2 自日治時期以來，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將台灣原住民族分類並系譜性地建構其下各群的關係，使各族群朝向集體化發展，成為具體可被辨識的統治客體。泰雅族，依照語言、方言作為分類階序，並對應所在的地域，可分成賽考列克（Sekoleq）系統及澤教列（Tseole）兩大系統，兩大系統下又可細分為數個亞系統。本文提及的梅嘎蒨群則是屬於澤教列系統—莫里拉（Mererax）亞系統—（廣義）加拉排群（廖守臣1984: 8-9）。
 - 3 梅花村境內在清朝時期建有梅嘎蒨社，分成八個集團，屬於澤教列加拉排群。或是居住在義興村以南的溪谷，日子一久，自成一群，常自稱為梅嘎蒨群。日治時期，日軍向李嶼山進擊，梅嘎蒨社也參與攻擊，最後投降，日軍在現址設立駐在所，管理諸社。光復之後，諸社經過異動而定居了下來，成為現在的梅花部落。以前這裡種植櫻花，據說日治時期天皇來此巡視。後來才改種梅花。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2015。Retrieved from: http://www.tipp.org.tw/tribe_detail3.asp?City_No=7&TA_No=8&T_ID=480 on Jul. 20, 2021.

勇線推進之前原本相互支援抵抗官方，1907年隘勇線侵略加劇後逐次分化。

現今梅花村面積33.35平方公里，共分10鄰。大約160年前，梅嘎蒞群主要住在梅杜依部落（舊馬胎部落），1920年代官方為集體安置來自栗園等後山方面的移住者，把原本住在梅杜依的加拉排群（Mklapay）群移往梅嘎蒞社，1946年左右國民政府再一次將其搬遷到梅花溪下游的第九鄰現址（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編2009: 715-717）。今屬梅花村第八鄰的梅杜依（Metuiy）部落，位於義興村、梅花村交界，發音近似義興村的馬胎（Matuy），可知兩地淵源。當地耆老表示，在後山基那吉群移住者到來前，兩地同屬梅嘎蒞群狩獵耕種的領域，戰後族人也取道馬胎古道徒步至內灣購置生活物資。⁴這幾個部落現今與周邊鄉鎮的網絡關係成形於隘勇線戰役之後，目前沿鄉道竹62線可向五峰鄉花園村、尖石鄉錦屏村出入，向北途經牛角山周邊及義興大橋也有鄉道竹59線通往橫山鄉。

為挖掘梅花村的記憶資源，筆者將縱覽內橫屏山區旁及向天湖山、油羅山、麥巴來山一帶，進行該地周邊隘勇線抵抗記憶的梳理。歷史文本分析法有助於解讀日據時期新竹廳的討伐新聞，分析隘勇線前進政策如何鎮壓、分化、招撫各部落；記憶政治理論則有助於了解同化政策施行後，地景改造為何能淡化衝突記憶，引導族人適應山地國家化的現實。

本論文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要的歷史文獻，在隘勇線政策大規模包圍、軍警聯合討伐的階段（1904-1917年），該報讀者以在臺日人為大宗，待到《漢文日日新報》的發行期（1905-1911年）有漢人讀者加入，但原住民讀者始終微乎其微。正因當地泰雅族是未被現代報紙納為受眾的「他者」，媒體如何再現被討伐的人群、如何報導和修辭、留下何種影響，值得我們關心。誠如李承機（2003）指出《臺灣日日新報》的御用性質必須警惕，但是為了挖掘族人的聲音與身影，利用這份日治時期最大日刊報紙在資訊記錄與傳播上的即時性、情境性、脈絡性、漸近性質，以及為面對社會大眾的修辭考慮保留的敘事性、細節和社會情境，對本文仍有

4 這段紀錄來自於筆者訪談天湖部落耆老的口述。翫東·寶給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1年11月21日，五峰鄉天湖部落。

必要。筆者將慎重觀察日本官方與被討伐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與懸殊地位，同時納入當地人的觀點以嘗試後殖民的閱讀。

本文分析步驟包括：第一，梳理官方打造的蕃地勝景「內橫屏觀櫻」出現的背景與過程。第二，檢視吉野臺（櫻山）櫻花符號的意義賦予與擴散過程，亦即官廳以勝景旅行解構血染之地的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操作。第三，脈絡化《臺灣日日新報》的討伐記事，從被討伐者的逆向視野，勾勒梅嘎蒞等社的抵抗姿影。第四，分析1917年以後，在梅嘎蒞警戒區內形成的多族群社區，以及梅嘎蒞人與官方認同的分歧。第五，探尋2000年以後梅花村人破碎的隘勇線反抗記憶及其當代意涵。本文希望找出今梅花村在理蕃戰爭中的歷史斷傷，說明殖民官廳主導的集體記憶之本質、特性與弱點；藉此觀察當代梅花村人如何在與殖民者記憶共生之處，慢慢說出族群自身那段過往。

二、官廳打造的新竹蕃地勝景：內橫屏觀櫻

風景名勝的標定，除了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公開評定之外，族群因素扮演一定角色，卻經常被隱蔽。本節以日治時代新竹州的案例，說明「蕃地勝景」⁵登場的背後，隱藏了怎樣一段血的歷史。

1870年《淡水廳志》記錄的「全淡八景」，除了香山觀海（香山）、鳳崎晚霞（新豐）、隙溪吐墨（客雅溪口）之外，有一處孤懸在外，被喚作——指峰凌霄（竹東五指山）（陳培桂1993）。1888年〈新竹縣採訪冊〉羅列竹塹八景時，仍只有它遠離竹塹平野（陳朝龍編1999）。

指峰凌霄，是五指山雲帶繚繞插天入雲的丰姿。凌霄，自是平地視野，漢人的修辭。五指山，往昔為原客的楚河漢界，今日仍為三鄉界山（竹東鎮、北埔鄉、橫山鄉）。指峰風緻，約當從今日芎林、橫山、北埔等客庄仰望而去的山景，從漢人入墾較早的芎林鄉飛鳳丘陵南眺，五指山崛起於

5 蕃地（或蕃界）為日治時期對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稱呼，以特殊行政區與一般行政區作區分。本文為呈現文獻脈絡保留時代用詞時，「蕃山」指傳統領域內的山脈、「蕃社」指部落、「蕃人」指原住民（族）、「未歸順蕃」、「兇蕃」指拒受治理或抵抗官廳的原住民（族），無歧視意味。

airiti

平原盡頭第一排，秀峰起伏，稜線歷歷，蒼紫奪目。然而這幅風景卻迥異於五峰鄉重巒之上俯視所見。因為五指山標高在800-1,061公尺之間，是雪山山脈走下平原淺丘前的餘脈，最高峰與周遭的鬼澤山、扇子排山、梅山、向天湖山相當，比起鵝公髻山、油羅山則落差500到700公尺。因此，五指山並非因高峻中選，而是作為漢墾區、隘墾區前進蕃地的前沿，位居客家人與泰雅族、賽夏族的接壤帶，而更增添了神秘想像的面紗。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舉辦「全臺八景十二勝」民衆票選時，五指山仍穩坐十二勝榜上，與角板山、獅頭山、旗山、太平山等族群屏風共同媲美（〈作者不詳〉1927/08/27）。同一活動中「內橫屏觀櫻」也被提入名單，雖然最後未參賽，但於1933年被登錄為官定史蹟名勝（〈作者不詳〉1927/09/05）。

國府治臺、新竹縣市分治之後，新竹縣議會於1954年通過省文獻會重擬的「新竹縣八景」。五指凌霄、鳳崎晚霞蟬連之外，八景新增原鄉勝景三處，包括清泉試浴（五峰鄉清泉）、內灣垂釣（橫山鄉內灣）、馬武連峰（關西鎮馬武督），橫屏觀櫻列入十二勝，但改稱為「錦屏觀櫻」（黃奇烈1957: 206-207）。⁶這個日治時期新竹州第一個「櫻之名所」，遺址位於內橫屏山頂南坡，初名吉野臺，又叫櫻山，在今梅花村梅拉姆拉克部落境內，但因土地歷經多種利用，櫻林景觀已不復存在。甚至，錦屏觀櫻的名號，也在2000年後被挪用到鄰村，改指鄉公所營造的錦屏村那羅櫻花林。

勝景座落原鄉，反映山地開放的進程、大眾消費往山區的進展。從橫屏觀櫻、錦屏觀櫻、櫻山無花，到地景所指轉移和被遺忘，還反映政權對地景（Landscape）的看待與操作。山區地景，從無名山林到幽勝景區並非一蹴可幾。在1920年代日本內地的旅行產業流行到臺灣以前，山區基礎建設（交通、治安、衛生）是旅行活動的要件，而官廳隘勇線的推進、警備體系的建置，更是民政的前提。新竹廳的勝景出現在蕃地行政區，要到1917年以後。因此，山地勝景可視為治理的指標之一，其所在地幾乎都經歷過軍警討伐，並在後來形塑出「摩登蕃社」等形象。以下，僅就《臺灣日日

6 新竹縣八景，其餘為獅山佛洞（峨眉鄉獅頭山）、青湖棹月（寶山鄉青草湖）、飛鳳探梅（芎林鄉飛鳳山）。戰後初期內橫屏山（錦屏觀櫻）、北埔（秀巒春曉）退居新竹縣十二勝景，其餘仍在八景行列。

新報》橫屏觀櫻地景的鼓吹為例，說明勝景營造與空間記憶之間的關係。

首先，介紹日本人畫家石川欽一郎在《臺灣日日新報》刊出的一幅炭筆素描（參見圖1）。⁷1910年6月刊出的〈新竹內橫屏山隘勇線〉，出現於內灣上坪隘勇線、麥巴來隘勇線先後推進完成的時間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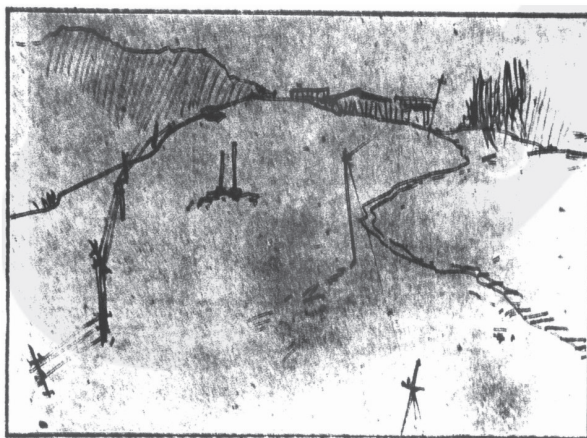


圖1：新竹內橫屏山隘勇線

資料來源：石川欽一郎。1910/06/30。〈新竹內橫屏山隘勇線〉，《臺灣日日新報》。

標高926公尺的內橫屏山頂在這幅畫裡一片光禿，是軍警聯合的討伐隊在推進隘勇線時，伐木淨山的典型景觀。畫面中以隘勇線的包納範圍和警備設施為焦點，左側的通電鐵條網沿著稜線的邊緣蜿蜒而上，山頂矗立著監督所之類的建築。石川曾陪同佐久間總督巡視臺北、桃園、新竹等地隘勇線，尋找宣傳畫的題材（顏娟英2000: 187, 189）。⁸這一幅現地速寫，展示隘勇線制高點景觀的訴求明顯，不排除是他親臨寫生。畫中陡斜的山頂空盪枯索，透著肅殺感，與石川以明亮光線、清麗色彩表現的一般風景畫大異其趣（倪再沁2002: 74-84）。

七年後，在這幅作品速寫的山頭，空前綻放了大片櫻花，是移植自日本

7 1907年石川欽一郎以臺灣總督府陸軍部幕僚附陸軍通譯官身分到臺灣，總督府委請繪製日軍征臺與原作民部落的畫作，如〈北白川宮殿下御奮戰圖〉（1909年3月）、〈蕃界圖〉（1909年7月）等。

8 石川寫生和遊歷之地遍及臺北到新竹的蕃地、臺中到南投的蕃地、阿里山、高雄、澎湖等地。

的一千株吉野櫻。1917年4月《臺灣日日新報》的首度報導，介紹它是官廳為「紀念御大典」（大正天皇登基）所種：「因為此地氣候與內地酷似，移植結果良好，全部萌芽，今年開始吐蕊，目前開到六分，一週內應可滿開。此地雖是蕃地，但有臺車之便，山頂展望絕佳，雲彩變幻千姿萬態，非筆墨所能形容。」這片櫻花林一開始就被期許為：「全島視察蕃地隘勇線警備狀態的最適當的場所，可作一天一夜的輕旅。」（〈作者不詳〉1917/04/06）⁹

1915年這個山頭被官廳取名為「吉野臺」，1917年12月又追加了2,500棵內地櫻，在向陽高崗形成3,500棵醒目的櫻花林（〈作者不詳〉1917/12/06）。從新聞發布當月到次年櫻花盛開的四月，有如開幕秀一般，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宏、野呂寧技師、遞信省技師、覆審法院院長等高官，在新竹廳長陪同下接踵視察。政治性的植櫻紀念，延伸到官吏的山地視察和參訪休閒。此外，總督府還聘請外籍活動寫真師，縱貫烏來、角板山、內橫屏山、霧社、日月潭、阿里山到阿猴蕃地，拍攝一系列影像，以漢人為對象在全臺巡映，搭配演講等活動，宣導治理現況（〈作者不詳〉1917/12/06）。

1919年起每逢春天，報紙上便有多回的橫屏花信報導（〈作者不詳〉1919/02/10）。強調為內地種的賞櫻活動引來文人雅集，《臺灣日日新報》〈大和短詩〉小欄出現對內橫屏山的歌詠，1921年更出現以〈屏山櫻〉為題的漢詩，描繪傘轎絡繹於途的風光：「博取臺灣第一名，蕃地內橫屏山櫻，閑人曳筇蓋不鈔，聞滿開今日此頃。」（竹塹道人1921/04/21）

討伐行動將隘勇線監視區據點的林野夷為平地後，移植強烈具有日本民族隱喻符號的櫻花。事實上，1915年紀念天皇登基三週年的植樹活動並未被報導，換言之，不是紀念事件的本身，而是它的被利用，塑造了吉野臺的功能——視察、紀念兼賞櫻。從植櫻紀念到葉茂花繁，吉野臺不僅因花信議題每年多次在報紙上曝光，更招來政要名士視察遊賞，使櫻花（國民）精神、內地連帶感和摩登蕃社的印象被連結。如此帶有「正統性」意味的粉豔每年循環上演，帝國的正統與圖騰開枝散葉，其衍生出的權力空間——蕃地勝景，又被治理儀式及山地休閒巧妙融合應用。

景觀林的物質媒介，櫻花的象徵符號，長時間占據在部落居民舉目可見的山頂，對外形成風尚，對內部居民的精神帶來影響。誠如皮耶·諾哈（Pierre Nora）曾在《記憶所繫之處》一書中揭示：

我們探究的不是那些具有決定性的事物，而是它們造成的影響；不是那些被紀念的行動，而是它們留下的痕跡以及相關紀念活動的安排；不是為了研究事件本身，而是為了瞭解事件在時間之流中如何被建構，瞭解事件意義的消失與重視，我們不探究往事如何發生，而是瞭解它如何持續地被利用，它的應用與誤用，以及它對於當下造成的影響。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諾哈2012: 18-19）

依此，讓我們再次凝視石川欽一郎描摹的，因討伐廓清而焦枯的內橫屏山頂。我們將會看見1914年以後隨著日本文化符碼的入侵，武力鎮壓記憶徘徊的這個山頭，地景歷經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連續性的改造。隨著理蕃政策從威壓期進入威撫期的1917年，在討伐記憶上鋪蓋「蕃山輕旅行」的文化記憶，則明顯是刻意的操作。此時內橫屏監視區內的教育同化、養蠶農耕、梯田開墾正值啟動，無論是殖民者的討伐，抑或部落的抵抗，兩者都被壓抑在記憶支配的深處，成為必須遺忘的過去。

因此，1917年橫屏櫻花勝景的打造與宣傳，並非風雅，而是與討伐後的殖產興業、稻作推廣、同化教育齊頭並進。吉野臺的山頂紀念空間與當地部落的相關位置，大致如下（參見圖2）。



圖2：內橫屏山吉野臺與周邊景點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製圖。

如圖2所示，隨著監視區的劃設，監督所、分遣所、駐在所的出現，區域秩序與先前截然不同。在隘勇線導致的區域空間結構改變、殖民者成爲優勢主體之後，以櫻花林的出現爲表徵，衝突與創傷的痕跡被修飾。

內橫屏山頂曾長時間爲原住民族採集、游耕、燒墾之地，殖民開發導致地景變遷。從原爲蒼林和茅原的山頂，到鎮壓行動中的砍伐焚煙，最後換來舶來種的一片紅斑。這個新地景形成的過程，應該對當地人有複雜意義，只是我們已經很難得知。櫻花林，是文化治理在山地常見的手段，同樣的符號與意象，也出現於烏來、角板山、霧社、日月潭等地。只是戰後內橫屏這些櫻花不少遭政府造林砍伐，當地人逐漸遺忘其盛景，後世更不知其來歷。

這樣又過了三十多年，國府政權採用新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手段，日本殖民帶動的地景更新才落幕，達到該地景發展歷程的終點。代之而起的是文化中國的符號——梅花，在殘餘的殖民地景上，召喚與填充另一波記憶政治。

探究殖民者如何透過地景符號化進行帝國文化統合，是審視日治時期山支配管理與精神改造的一個基點。下一節我們將從更多文獻，追索橫屏觀櫻如何在時間之流中，持續被利用於打造蕃山輕旅行，進而變成史蹟的過程。

三、內橫屏登山健行：吉野臺生產的文化記憶

大正年間，臺灣興起了登山運動（林玫君2003）。登山風，很快就吹進了樹杞林蕃地。吉野臺櫻花林因海拔適中，登爬容易，交通方便，一、兩日可來回，很快就成爲北臺灣登山愛好者青睞的對象。

1920年代地方性的登山組織，在內橫屏山已有「月例登山」的固定活動。1927年4月臺灣山嶽會成立新竹支部大會時，特別選在該地櫻花滿開的日子。臺灣最大登山組織擴展支部的消息，被以搭配紀實繪畫的方式大幅報導（參見圖3）。



圖3：內橫屏山上之山嶽會新竹支會發會式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1927/04/12。〈內橫屏山上之山嶽會新竹支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

當天，主辦方的新竹州知事古木章光（兼任新竹支會長）率領職員、竹東俱樂部會員，包含女性成員兩名（皆為日本人），總計20幾位支部會員，乘汽車進山。另一團則由總督府內務局文教課長生駒高常領隊，帶領臺北總會會員及傳教士、美籍留學生等3名，搭乘20餘輛臺車，從新竹站浩浩蕩蕩抵達。到達終點站內灣之後，地方與中央的兩路人馬穿越鐵線橋徒步上山，沿錦屏山峽谷登爬一個小時左右，汗流浹背地抵達山頂會場。

發會式設置在吉野臺，會場中央設有營帳，外圍有被動員來參與的泰雅族學童。支部幹事、支部長及官方指導者，陸續報告創立經過和宗旨，最後高呼萬歲兩輪，完成儀式。這場成立大會由州郡官廳參與組織運作，總督府文教官員南下督導，登山活動被期待發揮鍛鍊體魄與教化精神的目的是，記者如此報導這個空間：「這個山頂是討蕃時代忠勇軍人流血的古戰場，有忠魂碑，環繞周圍的群山彷彿波浪起伏，像這樣完全獨立的山峰真是罕見。」（〈作者不詳〉1927/04/12）

殖民者在曾是鎮壓當地民族的交鋒地，打造植滿櫻花的一塊紀念性空間，林下集合殉職者墳塚，並建造一座忠魂碑。如圖3所示，插圖聚焦再現了致詞者和坐在中央席次上的整排長官，以及端坐的登山會員。在他視線

最遠處，點綴著可能是教育所學童的一些黑影。而那些站立的少數者，正是在這個景觀空間被施予價值洗禮，又在教育所、開墾地被施予日語同化教育和水田定耕實作的主人翁。諾哈曾言：「記憶所繫之處是物質性的場所、具象徵性的光環、功能性的，但他們必須是某種儀式性的對象時，才能視為記憶所繫之處。」（諾哈2012: 26-27）在吉野臺的案例中，這個空間成爲了記憶磋商的生成容器（productive container），在官廳、駐在所、登山協會、媒體、參與者的互動下，成爲官方打造國家山地治理記憶和符碼化討伐歷史的場所。

1928年「內橫屏之櫻」與「南投李花」、「太魯閣峽谷之櫻」、「三叉山杜鵑」等，被《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爲「臺灣賞花名所」（〈作者不詳〉1928/01/24）。吉野臺也和鄰近的內灣溪谷、尖石溫泉等熱點逐漸串連，形成尖石前山最早的旅遊線。1930年以後，治安無虞，橫屏觀櫻或橫屏登山，已是山嶽會的熱門活動。1933年4月，臺北山嶽會員在該地舉辦「露營賞櫻」活動。此時，報導科技已有大幅進步，《臺灣日日新報》改用解析度較好的照片報導花訊。〈新竹州下內橫屏山之櫻滿開〉這則照片，沒有搭配報導，直接以十幾位男性遊賞者的瀟灑身影訴諸讀者，傳遞登山賞櫻的戶外運動（參見圖4）。



圖4：新竹州下內橫屏山之櫻已滿開

資料來源：〈作者不詳〉。1933/04/12。〈新竹州下內橫屏山之櫻滿開〉，《臺灣日日新報》。

1937年出版的《竹東郡勢要覽》，已在竹東郡管內圖上標出史蹟名勝四處（竹東郡役所編1937: 125）。內橫屏之櫻與尖石奇岩在同一條山區道路上，以下是針對「內橫屏之櫻」的推薦文字：

【內橫屏山之櫻】已成為新竹州唯一的櫻花名所，海拔3,000尺，在山頂平坦處可以廣角度鳥瞰，其中一側種植了吉野櫻。這是大正四年支廳長中田秀造作為御大典紀念事業倡議而試植的，之後又屢屢補植，現在胸徑達一尺的鬱鬱成木已有400棵。每到陽春四月，潔白花瓣爛漫，象徵國民精神的真髓，宛若母國的春天被移來。雖然其中也間雜了本島土生的山櫻，但真正的大和櫻卻是十分稀罕的。若以僅僅一日的行程，想一併觀賞蕃山的情趣，那麼全島捨此無它。近傍的內橫屏駐在所還有modern的蕃社，總戶數大約一百。無論是作為成人的蕃地旅行，或作為不識母國風情的學童遠足地，都廣受社會推薦。（ibid.: 121-122）

竹東郡的介紹，強調吉野臺是為倡議「御大典紀念事業」，而在展望極佳之地營造的「新竹州唯一的櫻花名所」，潔白花瓣「象徵國民精神的真髓，宛若母國的春天被移來」，而且此地有「Modern的蕃社（モダンの蕃社）」，鼓勵成人、以及沒有見過「母國櫻花」的學童前往參觀。

1937年以後，內橫屏山取代因抗日事件受影響的霧社，被《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為：「全島第一的櫻之名所」、「四月中旬可以欣賞櫻花雪」。除了文字鼓吹外，還附有內灣進、員峽子出的環型路線簡圖，鼓吹臺北—新竹兩天一夜的「觀櫻健行」：

Hiking族可於週六前往，回程順訪以天然氣噴出著名的員峽子石油坑。

建議course如下：

第一天：臺北（長程汽車1元21錢）—新竹（bus30錢）—竹東（徒步10kilo）—內灣（徒步3kilo）—尖石（第一日總行程13kilo）

晚間：住宿於尖石農業傳習所（住宿前要向新竹州申請）（竹東到內灣間搭乘臺車，單程一人55錢）

第二天：尖石（徒步4kilo）—內橫屏山（徒步8kilo）—上坪（徒步4kilo）—員峽子（徒步2kilo）—石油坑（徒步2kilo）—員峽子（bus40錢）—新竹（長程汽車1元21錢）—臺北（第二日總行程20kilo）

預設出發時間：星期六午後

△第一日 臺北午後兩點—抵達新竹午後四點零八分—抵達竹東午

後四點半—抵達尖石午後七點半（住宿）

△第二日 尖石出發早上八點—抵達內橫屏山早上十點—同所出發
中午十二點半—抵達石油坑午後三點半—抵達新竹午後四點半—
新竹發車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抵達臺北晚上六點四十九分

※最好攜帶五萬分之一的樹杞林蕃地地形圖，油羅山部分。
（〈作者不詳〉1937/04/10）

從內灣進入，到尖石農業傳習所之後開始登行，翻越內橫屏山，途經梅嘎蒨社、梅后蔓社等等，下到上坪，最後從員峴子石油坑出來。這個行程將登山健行結合產業見學，場域則橫跨了山地部落與沿山客庄，一路上可以飽覽農、林、礦業。終點站員峴子石油坑的天然氣更是國策產業，在1940年臺灣總督府為行銷臺灣而支援拍攝的影片《南進臺灣》中，員峴子油田也在介紹之列（國策記錄映畫2008）。¹⁰

綜合上述從吉野臺紀念空間衍生出來的活動，包括賞櫻、視察、團體聚會、登山、露營、健行和見學。無論是公務視察、團體活動、運動休閒、輕旅行或教育學習，都使原是武力征服泰雅族的道路，被改造為具有現代性意涵的山區治理開發或運動休旅之路。日本人或臺灣人（原、客、福佬人），在往昔軍事道路上的循環履踐，參與形塑新風尚，協同營造治理有成、穩定祥和的地方氛圍。這個行程的入口，由尖石農業傳習所揭開原民的新生活樣態，而其終點新竹天然氣公司景觀，更為這條帝國規訓的道路，噴染一層產業躍進的寓意。

中日事變之後，內橫屏山的旅遊仍受喜愛。1938年4月，臺灣山嶽會理事長帶領會員觀櫻登山（〈作者不詳〉1938/04/08a, 1938/04/08b）。同年12月，新竹軌道會社加開巴士輸運登山者與泡湯客（〈作者不詳〉1938/12/08）。直到1940年，《新竹州要覽》仍定例介紹內橫屏山的史蹟名勝（〈作者不詳〉1937: 23; 〈作者不詳〉1940: 222）。

殖民者透過天皇登基紀念空間以及富含民族象徵的櫻花，進行政治認同的符號塑造，將征服階段的衝突記憶重構為柔性的櫻花林記憶。在吉野

10 該片目的在使日本內地人從國防、產業及文化各層面，對臺灣有更廣泛的認識。有關新竹的介紹，強調農產、礦產、畜產、林產豐富，有茶、天然氣、石油、碳粉等富源。

臺上的各種新活動，隱含了對日本文化的崇拜與緬想，將討伐形塑成文明治理的筆路藍縷，為過去的殘暴創造正當性。這種作法誠如諾哈在〈記憶所繫之處，另一種歷史〉提到：

記憶所繫之處既是物質的、象徵的，也是功能性的，三種意義同時存在，只是程度各異。看起來純屬物質性的場所，例如一間檔案館，唯有在想像力賦予了象徵光環時，他才會變成記憶所繫之處。（諾哈2012: 27）

依照諾哈的提醒，我們能夠發現記憶所繫之處的產生歷程，以及其與一個物質空間、一種象徵性、一場儀式之間的關係。殖民者透過文化景觀柔化理蕃行動的殘暴性的同時，透過一場場具儀式性的視察、發會式、定例登山等象徵活動或其衍生物，重複實踐文化記憶的生產，使新的記憶深植土地。而在登山組織協助提倡賞花風尚、登山健行走出連結山地與一般行政區的環形路線的推進下，參與走踏吉野臺路線的人們，不斷重複踐踏征服者的路線，也不斷內化了規訓的視野。就在塗銷抵抗記憶、塗刷文明治理記憶的循環中，那些血的歷史已被壓抑在層層櫻瓣之下。

針對教育所學童的儀式洗禮，正企圖將兒童的文化認同從他們父執輩手上奪走。兒童的父執輩，是隘勇線戰鬥記憶的核心群體。借用諾哈所述的「記憶的共同體」（Gedächtnis Gemeinschaften）可知，他們與其接受同化教育的下一代，正在形成分裂相異的集體記憶。官廳營造的登基紀念植樹及忠魂碑符號，模糊討伐及抵抗的歷史，片面滋長歷史重大事件的詮釋權，使當地部落記憶所繫之處的山頭抵抗記憶被分化，或被扭轉為對日本現代性的仰慕。

如此一來，內橫屏櫻花地景的出現，便呼應諾哈提到的——只有兩種事件可視為記憶所繫之處，而判斷的依據完全不在於其規模：

一方面，有些微不足道，當時幾乎未受特別注意的事件，在人們回顧歷史時，反而被視為新事物的濫觴或新時代開始的轉捩點，因而變得備受重視。另一方面，有些事件當下雖然不算大事，卻立即被賦予某種重大的象徵意義，而且一切還在進行之際，事件本身就已預先自我紀念了——透過媒體的運作，當代史每天都有許多這類一出生就被宣告死亡的企圖。（諾哈2012: 18-19）

在內橫屏山隘勇線推進的進程中，那些槍砲與肉軀的衝突、土地的喪

失、人權的淪喪，對當地人來說自然比櫻山美景更為強烈重大。但無足輕重的吉野臺卻在文化媒介的運作下，一開始就被作為紀念地而出現，之後也證實這片美景的操作、扭曲，代理了當地人的發言，為部落披上外衣，塗抹大和摩登的妝容，它管理了當地人的記憶。在官廳、媒體和社團助長的輕旅風尚中，梅嘎蒞群的生活被編織進天皇治理的垂直時間，和殖民現代性的橫向空間。從官紳名流到市民學童，外來者的到訪與互動，逐漸主導和剝奪當地人的集體記憶，使他們記憶流離消亡或走向他鄉。

於今我們梳理橫屏觀櫻勝景的形成史，得知當地經歷的隘勇線掃蕩史是尖石前山的苦難期。那些碎片、斷裂、刻板的歷史必須更有脈絡地被觀看，更整全地發出聲音。

四、梅嘎蒞社七年抵抗：解構勝利者的隘勇線前進報導

本節將繼續探討橫屏觀櫻勝景，是如何成為一系列隘勇線部隊威撫並用後的產物。尖石鄉境內在日治初期推進的隘勇線有九條，為期十年（鄭安晞2011: 206-229; 林一宏2007; 劉澤民2017）。¹¹其中，為控制內橫屏山區到麥巴來山區而推動者，有內灣上坪隘勇線、麥巴來（Maybalay／マイバライ）隘勇線。兩線連結先前舊砲臺隘勇線已納入的外橫屏山、麥樹仁山、尖石地區，進一步將北角、內橫屏山、向天湖山、油羅山到麥巴來山沿線納入線內。¹²兩線推進期間遭遇以梅嘎蒞社（密加蘭、美卡蘭，今梅達拜部落前身）為首的梅嘎蒞群激烈抵抗。本節將梳理新竹廳隘勇線前進本部（時稱新竹前進隊），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布的「討蕃動態」，嘗試解構官方的負面描述，從中釋出梅嘎蒞社、周邊他社、少數漢人的身影，

11 包括：舊砲臺隘勇線（1907年5月11日-6月30日）、帽盒山隘勇線（1909年8月13日-不詳）、內灣上坪隘勇線（1909年7月25日-9月10日）、麥巴來隘勇線（1910年5月5日-6月3日）、內灣溪上游隘勇線（1910年6月15日-9月23日）、李嶼山隘勇線（1911年8月1日-10月31日）、基納吉隘勇線（1913年6月25日-8月2日）、馬里克灣隘勇線（1912年9月24日-12月17日）、霞喀羅隘勇線（1917年5月23日-8月2日）。

12 包括：外橫屏山（內灣）—麥樹仁山（尖石）—北角（北角）—內橫屏山（梅嘎蒞）—那羅山（那羅）—牛角山（義興）—向天湖山（馬胎）—油羅山、花園溪（梅后蔓）—羅山（Takunan）—麥巴來山（麥巴來社）沿線地域。

解讀泰雅族的抵抗回應及當地族群關係的變化。

(一) 首先，梳理內灣上坪隘勇線（1909年7月25日-9月10日）推進期間，有關梅嘎蒨社及其附屬小社的反抗報導：

內灣上坪隘勇線由尖石經內橫屏山、向天湖山到上坪溪岸，橫跨多座山體。該線推進到內橫屏山的東側時，遭遇梅嘎蒨社及其附屬小社激烈抵抗，日警攻占的制高點即石川欽一郎描繪的內橫屏山隘勇線高地。與前進隊對峙的梅嘎蒨群，屬於澤敖列（Tseole）語系的加拉排群，從清代到日治初期在內橫屏山、向天湖山、油羅山、麥巴來山發展出多個歷史悠久的部落。隘勇線前進政策結束後，總督府於1920年代將後山基那吉群分批移住到前山梅嘎蒨群的分布地，才開啟今日該地族群混居的樣態。（林一宏 2007: 114-115）

進入正題之前，先追溯1909年之前，梅嘎蒨等社反抗推隘隊的情況。早在1903年北埔樹杞林隘勇線推進期間，上坪部隘勇監督所已掌握內橫屏山東西兩側部落順逆不一的態度。

東側（尖石方面）的梅嘎蒨社等頭目，推測他們稍早幾日前的馘首行動將招來官方討伐，商議之後決定再出草抵抗，並預備往馬胎社（マトエ／Matuy）方面的高山藏放家資、安置眷屬。前進隊掌握的線報表示：梅嘎蒨社的「〔頭目〕Maray Tohos將家中用品藏匿到馬胎社前方的山中，並把小孩轉送到深山裡，伺機出草」（〈作者不詳〉1903/11/13）。¹³馬胎社為梅嘎蒨社的小社，在此行動中一致反抗。

內橫屏山西側（五峰方面）的梅后蔓社（メホマン／Mayhuman，今花園部落前身）則不同。梅后蔓社與日警治理的漢人生活空間接壤，受平地文化影響較深，已有族人種稻，或遷入上坪界內成為所謂的「線內移住蕃人」，住在隘勇線邊緣者也曾請求日警保護。上坪監督所發出的訊息表示：

Wilah Nabon、Pahu Tengah，向來若進入上坪管制區就希望受到上坪保護。梅后蔓社在隘勇線附近種稻為生的人很多，他們怕漢人（土人）加害而不敢去收割熟稻，因此希望派出所送國旗給他

13 人名之日文拼音為：マライ トッブス。

們。(ibid.)¹⁴

接下來進入主題，介紹1909年7月25日到9月10日內灣上坪隘勇線期間，有關梅嘎蒨等社的報導。這些記事的特徵是，針對被討伐對象採用統稱（蕃人、他們）、細部描述少、充滿蔑視和嘲諷；內容表露的情境是，日本軍警動用大砲在山頭射擊，泰雅族人則修築掩堡進行游擊。

8月12日，新竹前進隊在報紙上發出攻占內橫屏山頂後的第一則信息。該信息傳達如下重點：一、8月9日我方占領山頂，當地人「暫時放棄了山頂，四散潰走。但在第二部隊右側的南方高地，仍看見多處掩堡，常見其出沒」。二、9日下午2時，當地人「三五成群從該高地東側的開墾地衝出來，前往竹林集合，五點的時候，試圖抵抗我方部隊，於是我方發動白砲射擊，他們一陣狼狽，再度逃入竹林之中」。三、「內屏橫山一帶盡為茅草平原，視野開闊」，能鳥瞰三方面的部落動靜，包括東北方野馬敢溪（Yabakan／ヤバガン）對岸腹地的三十多間屋舍的野馬敢社、東南方2,500里左右山腹上十幾戶的梅嘎蒨社、梅杜依社（Matuyseu／マトエセウ）¹⁵（林修澈2018: 123）、北方更遠處的加拉排社、麥樹仁社（Mksuzing／マクシユジン）。四、內橫屏山頂的地理優勢，能將「兇蕃置於死地」（〈作者不詳〉1909/08/12）。前進隊第一目標是取得內橫屏山制高點，以便架砲臺瞰制四周部落。當時梅嘎蒨社及其小社梅杜依社仍在抵抗，鄰近的同語系的野馬敢社、麥樹仁社、加拉排社也在監控之下。前進隊以「兇蕃」字眼，指稱在隘勇線推進時不受壓制、包納的泰雅族抵抗者，報紙則依照新聞來源，原樣引述傳播。

（二）其次，梳理麥巴來隘勇線（1910年5月5日-6月3日）推進期間，有關梅嘎蒨社、麥巴來社及其附屬小社的反抗報導：

麥巴來隘勇線以尖石的向天湖山竹林分遣所為起點，經北稜上行油羅山頂，西折經塔克南社（Takonan／タコナン，今羅山部落前身），南折通過麥巴來山，再往西經岩角、雙溪，抵達五峰的桃山分遣所。

14 人名之日文拼音依序為ウイランボン、バウトガン。

15 疑與他篇報導中的マトエウニ為同個部落，今譯為Matuyi（梅杜依）。

本線推進期間，日方預計遭遇的抵抗勢力將來自梅嘎蒨社、梅塔克南社（Metakonon／メタコナン，今羅山部落前身）、麥巴來社（麥巴來／マイバライ，今和平部落前身）及其附屬小社。在推至油羅山頂的一段，稱為油羅山隘勇線，忌憚有血緣關係的諸社聯合抵抗，尤其戒備。沒想到才一週，5月12日前進隊就在報紙上發出捷報，除了說明戰術的成功，也提出處置反抗部落和歸順部落的構想。由於信息較多，以下分五個方面歸納：

第一，針對意外中止抵抗的麥巴來社，介紹其順服經過：「麥巴來社在四月卅一日被年中軍隊〔新竹守備隊的一個中隊〕討伐時曾有抵抗，故而後來與警察隊戰鬥時，我方不排除他們會抵抗」；「該社的開墾地和住家都在新線腳下或僅僅數百米咫尺的對面山腹，因此極力抵抗是必然的；而且，該社又與毗鄰的民都有社〔Mintuyu／メントユー社，今民都有部落的前身〕及Kinahazukru〔キナハツクル社，石鹿社的小社，今不詳〕¹⁶彼此支援，頑強程度可想而知」（村上特派員1910/05/12a）。由於麥巴來社與民都有社聲氣相通，推隘之前又曾有反抗軍隊的紀錄，因此新竹前進隊以為勢必有一場硬戰。「所幸事實與預測相反，今田警部五月五日率領第三部隊佔領目標地點時，在麥巴來山腳發現該社三名蕃丁，於是我方向十八兒社〔Sipazi'／シバシー〕的頭目，教導招降三人的手段。兩小時過後，他帶著麥巴來社的頭目和男丁三人出現，提供雷明頓單發槍三挺，表明他們對前進行動並無反抗之意，並願意在能力範圍內提供協助。」（ibid.）5月7日，該社果然有四名族人，前往前進隊第三部隊協助，推測可能擔任嚮導、偵查或勸導歸順等工作。

第二，針對去年拚死抵抗的梅嘎蒨社，分析其已無抵抗能量：「去年八月內橫屏山方面隘勇線前進時，梅嘎蒨社頑強抵抗造成前進隊巨大損失，他們也受到重創，元氣大傷；在本次的前進行動中，若油羅山被我方佔領，全社將陷於死地動彈不得，若再反抗則勢必成爲末路窮鼠。」（村上特派員1910/05/12b）這既是日警對敵情的分析，也是招撫勸降的言說。

16 筆者曾請益包括五峰鄉公所退休的秘書張國隆（Buya' Bawnay）先生等多位當地人，均表示キナハツクル社的日文譯音難以還原爲泰雅語，加上有些小部落已經消失，因此無法判讀該部落具體所指。

第三，針對抵抗的梅嘎蒞社，脅迫外圍小社族人前往勸降：前進隊從勢單力薄的小社下手，或對「線外蕃」個人施加壓力，迫其居中傳話勸降。實例有二：一，「五日午後一時，梅嘎蒞社的小社馬胎社兩人（未歸順蕃），被宇野警部帶到第一部隊，一名留作人質，另一名令其返回遊說梅嘎蒞社歸順，約定好將遊說該社頭目等四名同來」。二，「七日午前八時，梅嘎蒞社的小社義興社〔Zihing／ジヘン，今義興部落前身〕頭目Baci Maray和Syat，也由馬胎社蕃丁兩人陪同從線外前來第一部隊，密告臺野江〔Thayakan／タイヤカン，今泰崗部落前身〕和天打那〔Tentana／テンタナ，今天打那部落前身〕兩社的情報」。日方使用砲擊威懲、壓迫小社、同族勸說等方法有一定效應，「聽說梅嘎蒞社有一名頭目Maray Tohos因畏懼前進隊的到來，已逃往塔巴霍社〔Tabaho／タバホ，今田埔部落前身〕」（ibid.）。¹⁷

第四，針對線內歸順部落梅塔克南社，規劃委以重任：「該社已使其在現居地從事農耕，不過梅塔克南隘勇監督所應進一步指導，啟發他們擔任所員的工作。」（村上特派員1910/05/12a）

第五，針對歸順後願意參加前進隊者，給予部隊編組。前進隊依照對抗樣態給予這些人編組，梅嘎蒞社歸順者專屬第一部隊；梅后蔓社、馬胎社歸順者同樣編入第一部隊；梅塔克南社、十八兒社、比來社的編入第二部隊；麥巴來社的則可編入任何部隊。前進隊評估此前參加第三部隊的十八兒社的表現，認為其在5月7日麥巴來線的第一回前進行動中確實助益不少（ibid.）。

以上，脈絡化呈現三條隘勇線推動期間部落反抗的概況後，讓我們再次聚焦梅嘎蒞社。梅嘎蒞社從1903年後不斷出草游擊，在圍剿該社的兩線討伐期間，又有至少十個月的激烈對抗。直到1910年5月9日，80歲的梅嘎蒞總頭目Unay Naban，才終於出面議和。他現身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給我們鹽和日用品！可見除了砲擊、分化之外，部落還遭遇物資封鎖，這是報導中未提及，卻可能是迫使歸順更關鍵的手段。

這值得記憶的一幕，其背後運作和歷史場景如下：

17 人名之日文拼音依序為：パイポマライ、セツタ、マライ トップス。

九日下午三時三十分鐘，梅嘎菴總頭目Unay Naban與七名男丁、四名婦女，到第一部隊本部輸誠。這位約莫八十歲的老蕃人之所以出面投誠，是因為前進隊佔領油羅山那天，嚮導人（嚮導蕃）Iban Yuwi曾帶領就在油羅山制高點正下方的馬胎社小頭目等人，實地了解前進隊推進的情況。嚮導人如此勸告他們：只要一人反抗，全社都會被討伐；凡是輸誠者，都會被批准，因此歸順才是正道。隨後，年邁的總頭目希望日方能解除先前部落因對峙遭封鎖，而缺乏的食鹽和日用品等。美宇野部隊長則指示，我方願意釋出特別的恩典招降，但也希望梅嘎菴社能勸導塔巴霍社和臺野江社一同歸降，爾後也應向我方報告他社出草蕃人的動態。待一同投誠之際，依憑上列條件得與日本大人會見，並乞求施給食鹽、鐵器等惠賞。而歸順的第一要件是，所有武器都必須繳納為官有，且要移住到隘勇線內。至於是否允許歸順，則要等到前進行動整個完成以後才能核定。只要部落不反抗，決不會被砲擊。若部落有需求，也允許前來請求。¹⁸（村上特派員1910/05/15）

依據前進隊的自我揭露，「嚮導蕃」這類型人物在油羅山攻防戰中扮演重要角色。梅嘎菴總頭目Unay停戰之前，嚮導Iban已針對火線下方的部落——馬胎社，進行心理戰。Iban帶領馬胎社的小頭目，實地觀察前進隊在油羅山推進的情況，並以一人反抗全社皆剿，加以恫嚇。馬胎社小頭目再將其見證與震驚，勸告總頭目，終於使日方在麥巴來線推動的第四天，就獲得意想不到的大成功。而後，總頭目若為保障全社安全，解除被封鎖的飢餓狀態，則必須履行勸導後山塔巴霍社和臺野江社歸降的任務，可謂天人交戰。

以上挖掘的印刷文獻，只是內灣上坪線、麥巴來線推進行間，部落被侵略苦難的九牛一毛。讓我們透過戰果報導的逆讀，試著從部落的視角勾勒梅嘎菴社七年抵抗的痕跡：

1. 1903年，梅嘎菴社及其小社馬胎社開始反抗。兩社仍維持傳統生活，與前進隊敵對，處於出草、被討伐、再出草之抵抗狀態。原本亦屬梅嘎菴社小社的梅后蔓社，則已改行水稻耕作，並善用隘勇線和監督所，作為與漢族衝突時的屏障和防衛選項。

2. 1907年，舊砲臺線前進期間，梅嘎菴群開始分化。梅嘎菴社及馬胎社由於地理環境、原漢接觸、生產型態不同，和梅后蔓社對應官廳時的態

18 人名之日文拼音依序為：ウイラ ンアボン、イーワン ヤユウ。

度逐漸分歧，梅后蔓社頭目甚至曾前往官廳密告。之後，梅后蔓社、巴思誇蘭社，仍為官方提供情報。

3. 1909年，內灣上坪線前進期間，梅嘎菴社和馬胎社激烈反抗，致受重創。他們在竹林間游擊，在山頂修築掩堡，與敵軍互有傷亡。最後，內橫屏山頂被日方占奪，部落遭白砲射擊，周邊部落同陷監控，梅嘎菴社進入食鹽與日用品遭封鎖的艱困期，但部落仍在抵抗。

3. 1910年麥巴來線前進期間，梅嘎菴社在麥巴來社、馬胎社、義興社等盟友被分化和壓制後順服。日警壓迫馬胎社人擔任觀戰者、遊說者，義興社人也在壓力下密告其它部落的抵抗情報。至此，麥巴來社在前進隊帶領的十八兒社嚮導人勸降下不得不歸順，梅嘎菴社老頭目也顛顛巍巍出面為族人索求物資。接著，各社都被迫接受勸降任務，或被編入前進隊戴罪立功，步上梅后蔓社、梅塔克南社、十八兒社的後塵。如此，日方才會在前進掃蕩的整體行動結束後，視其表現，決定是否允予歸順。

《臺灣日日新報》，是官廳政令宣導與消息傳播的最大媒體，也是記憶政治操作的重要工具。隘勇線戰爭中的輿論生產，高度仰賴這個最大的官方消息揭露管道。日刊新聞產製信息的來源，最前端為前進隊，經過官方機構的審查、報社機構的編制截取，以格式化的欄位，制度化地報導全臺各地的討伐動態。隘勇線討伐的性質是殖民政府與山區民族勢力的戰鬥，但是當前一週的多回討伐，因時差而堆疊成今日密集歸納的一篇新聞時，早已串接成結局清楚的故事。本週的故事串接下週、下個月、明年的故事，形成連載不息的大河劇。具有周期節奏性的各廳「討蕃動態」，多軌串流，既產製歷史，又虛構了歷史和感覺，可謂殖民地最無情、噤聲且漫長的戰爭轉播。

梅嘎菴四社的苦難，在殖民地山地戰爭中具有普遍性。該地的慘劇被絕大多數非泰雅族的讀者，以印刷物的途徑遠距收看著。梅嘎菴等社的案例足以表現，官廳如何以警察隊（及部分軍隊）為前導，運用砲擊、槍隊、密告、族人嚮導、作戰實況見證、壓迫小社去勸降大社、族群離間（異群離間、同群離間、同部落離間）等等手段，加速隘勇線的鎮壓及包納。在今日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前山隘勇線掃蕩作戰中，拼湊部落人民的殘

影，還原他們被片假名標本化的姓名，釋放被壓抑的微音，儘管杯水車薪，卻是對當地主體基本的尊重。無論是，梅嘎蒞社被迫歸順時開口索求食鹽和日用品的年邁頭目、馬胎社銜命返回遊說頭目的社丁、為日本軍警作馬前卒的十八兒社嚮導人，抑或向日軍提供密告的部落頭目，乃至為追緝原住民而觸電死亡的漢人隘勇及日本員警……這些梅嘎蒞社的苦難，也都是殖民地山地戰爭中普遍發生的苦難。

山地的苦難，滲入當地人骨髓。殖民者在法律的大義名分下，將「以蕃治蕃」政治手段正當化，並非不恐懼這些仇恨的記憶在部落間引發後遺症。也因此，討伐期過後，殖民者如何將浴血的山河塗刷上文明的花樣，便煞費苦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從記憶雙方共同仰見的那片櫻花林，開始訴說這個故事的原因。

五、梅嘎蒞警戒區：多族群社區裡梅嘎蒞人的認同分歧

社會事件成爲一個地景、一則傳說，除了因其重要性以外，媒介對集體記憶的具象化，占了重要角色。上面三節用了相當篇幅梳理吉野臺地景與隘勇線掃蕩作戰，在報紙新聞中的議題聯繫關係，既是聯繫，又是遮蓋。接下來，讓我們再回到千株吉野櫻凌霜待放的1917年，了解爲何吉野臺能在官方其它行政措施配合下，成爲多族群社區的集體記憶焦點。

1917年，是別開生面的一年，因爲這一年也是內橫屏山教育所（今梅花國小前身）和診療所，在警戒所轄下創設的那一年。此後，吉野臺這個紀念空間，被官方連結於報紙媒體和社會團體，供民衆行踏交往，既框限在地人的記憶，也驅動其它人群在此的區域活動。但殖民建置絕對不只通過文化治理，還有具體的政經產業投資。這時梅嘎蒞、馬胎、梅杜依、義興四社，正在梅嘎蒞警戒區體制下，形成有別過往的大梅嘎蒞社，即今擁有六部落的梅花村最初母體。¹⁹而大梅嘎蒞社又與此地的日本人、客家人，形成一個多族群社區。

19 梅花村現有六部落：梅達拜、梅杜依、梅阿尤達克、梅拉姆拉克、司普萬、梅魯庫互。

1917年2月26日，內橫屏山教育所在吉野臺設立，是樹杞林蕃地包含加拉排、馬里光、大安（控溪）、那羅等五所之首。課程包括：禮法、日語、算數、農耕（除草、栽培、飼育、加工），1929年遷至目前梅花國小所在地，是如今尖石鄉的第一所現代學校。1915年12月，內橫屏山蕃語講習所成立，僅次於角板山的講習所，提供山地治理人員學習泰雅語。蕃產交易所則更早於1914年成立，約莫同時也成立了內橫屏山開墾指導所，負責推廣梅嘎蒨溪（今錦屏溪）²⁰沿岸的養蠶、稻作、蓮草種植等新型產業。新竹廳在日治初期為全臺蓮草最盛產地，因品質優良成為富源，官廳發放獎勵金鼓勵原住民栽種採集，經交易所集中後，販賣到世界重要城市（張夢軒2017: 49; 溫振華2014: 22-23）。²¹

1917年12月，此時尖石前山最高治理機關之一的內橫屏山警戒所，²²首度在報上發文，行銷當地特色物產。

〈蕃人物產其他〉除了介紹年產的蓮草、蓖麻、木耳等交易量已有1,456圓，也逐一介紹了治安、衛生、殖產和教育步上軌道的情況。在納線治理的第六年，警戒所用新聞稿刷新的地方形象可歸納如下：一、衛生狀況：不佳，有肺吸蟲症等消化器官疾病，也有瘡疾患者，但都已在警戒所轄下的診療所防治。二、稻作推廣：梅嘎蒨、義興兩社水田面積已有二甲五分，當期水稻收穫22石5斗、陸稻468石餘；另有兩處開墾指導所，預計將指導開墾鄰近田園十餘甲。三、教育所：男童九名、女童三名，由有初教經驗的巡察教導中。四、泰雅語講習員：各支廳正在選拔，除了17名巡查，前五期的畢業生也有19名有能力者（〈作者不詳〉1917/12/06）。

新興事業接踵出現的1915年到1917年，對外是太魯閣討伐結束、殘暴的五年理蕃計畫終了，對內則是橫屏櫻花從種植到秀出的準備期。1917年，意味著新的時代來臨了。但是〈蕃人物產其他〉一文也留給我們逆讀

20 メカランの漢文譯名，另有密加蘭、美卡蘭等。

21 包括中國的北京、天津、寧波、上海、福州、泉州、廈門、汕頭、廣東、香港；以及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爪哇等地。

22 1909年成立的內橫屏山監督所，於1916年改制為內橫屏警戒所，1921年改制為內橫屏警官駐在所。

的縫隙：依據警戒所發布的數據計算，當時梅嘎漠四社總計有80戶383人，而內橫屏山警戒所有警力等90餘位（*ibid.*）。²³依此計算，在同化撫育開始的階段，警力就占了將近當地部落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見以1917年為界，先前以梅嘎漠頭目等傳統領袖為中心的部落社會，正在向以警察行政為中心的定耕社會轉型。其中，警戒所的設置點——梅嘎漠社，更是官方行政網絡的節點，尖石前山的政經文教中心，有如山地櫥窗、旭日東升的飛地，而其地標就是——吉野臺櫻花林。

那麼，梅嘎漠四社納入「撫育」的最初情況如何呢？當地人的觀點未曾被記錄於當時報紙，但泰雅族群在這裡生活，反覆被迫順從「操演」，在被規訓、形成被統治的記憶之同時，並非沒有對新秩序和意象的反對。殖民治理的「操演」，是雙面刃。如同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強調「刻版」對於殖民者十分重要，殖民者倚重固著的「刻版」來維持「殖民凝視」的穩定性，卻又焦慮感到「刻版」不是如此穩定，因此必須重複、持續地重新確認那些「已知」的關係和事情（Bhabha 1994: 74）。另一方面，吉野臺上櫻花年復一年的開謝，賞花、墾植、官吏視察、學校教育周而復始，忠魂碑終年鎮座山頭，殖民意象的反覆刻寫、散布於村落和山林大地，也會激發當地人反對的情緒。

根據翦東·寶給的口述，他的基那吉群家族原本散居於霞喀羅山到麥巴來山一帶，1934年大規模集團移住之後被遷於天湖部落。天湖部落當地人稱為R'ra'，為瞭望臺之意，位於向天湖山的制高點，四周無高山遮擋，群山在望，適合觀察哪裡有可開墾土地、偵查敵人動態或以狼煙支援結盟部落。²⁴黑帶巴彥則說，R'ra'是族人狩獵回來時，登高一呼，通報親人前來接應之地，是歡喜的處所。這樣的地方在隘勇線侵入並設置機關後，搖身一變成了隘勇分遣所或哨點，因此族人不只感到政治壓力，在文化和心理上也有強烈的羞辱感和被征服的感覺。²⁵

23 在吉田警部轄下有巡查32名、巡查員候補2名、警手6名、隘勇52名、公醫1名、雇員2名，總計96人，配置在18個分遣所當中。

24 同註3，翦東·寶給口述，劉柳書琴紀錄，2021年11月21日，五峰鄉天湖部落。

25 以上是黑帶·巴彥接受筆者請益這段歷史時的說明。黑帶·巴彥口述，劉柳書

我們不難從當地消息中心——內橫屏山警戒所發布的新聞，嗅出反對力量隱隱威脅著統治者的神經。從〈蕃人物產其他〉一文窺知，州廳動員極大量的警察正致力使梅嘎蒞社連結尖石與內灣，形成一條安全廊道。這個廊道緊隨隘勇線的掃蕩、警戒線的建置而浮出，然而，恰如玻璃櫥窗般脆弱的這個治理通道並未包納全境，治安事件是失去主體性的山地病體上的癥候，不時冒現出反抗官方的原住民烽火，以及國家機器以懸殊武力對付他者的硝煙。

1920年內橫屏山警官駐在所、錦屏山警戒所發布的兩起事件，有助於推知當地民群的反抗表現及其律法邏輯。

第一則：內橫屏山隘勇線第五號腦寮漢人母子遭滅首事件

1920年3月11日午後，牛角山分遣所下方、梅嘎蒞溪上游支流的臺灣製腦會社第五號腦寮，腦丁蔡五妹及其長男彭天送，在採集原料時遭滅首，內橫屏山駐在所本田警部補趕赴現場處置（〈作者不詳〉1920/03/14）。²⁶

諷刺的是，參照1919年10月17日的報導可知，臺灣製腦會社的腦寮原本設置在大湖支廳的北坑溪上游，由於憂慮北埔支廳轄下「蕃人動搖」，才申請於1919年轉移到內橫屏山設置，另一個重要理由是「從就業安全和搬運便利方面來考量，該地是歷來製腦事業地中少見的佳地」。該會社認為：內橫屏隘勇線包納地的腦質相當良好，應可有很好的獲利，目前先規劃55個腦灶、150個腦丁，若發展良好將繼續增員（〈作者不詳〉1919/10/17）。沒想到未及五個月，這個製腦工人總數約為部落人口0.39倍的「移工社群」，就遭到泰雅族出草，當地人以行動打臉了警方和樟腦會社的單方決策。這是該訊息重要之處。

第二則：馬胎社頭目遭塔克南社線外住民滅首事件

1920年5月23日報載，油羅山方面的塔克南社族人翻山越嶺，到錦屏山方面的馬胎社附近出草。日警偵知過去警備員曾射殺一名塔克南社出草

琴紀錄，2020年8月27日，尖石鄉嘉興國小。

26 蔡氏母子疑為客家人。

歸途中的線外住民，爲此同社的線外住民Yuming Bhot家族伺機復仇。21日，潛入線內埋伏。22日凌晨5點20分，錦屏山警戒所川端分遣所附近傳出槍響數起，巡查趕赴後發現馬胎社頭目Wacch Twasu已遭馘首。該頭目與另一名男丁攜著分遣所借來的槍啟程前往錦屏山途中，在分遣所附近遭Yuming Bhot一族約14、15人狙擊。狙擊者於馘首成功後，突破電網逃亡線外。警方推測馬胎社頭目因曾擔任過警備員的嚮導，所以遭到「兇蕃」報復（〈作者不詳〉1920/05/23）。²⁷

馬胎社頭目Wacch Twasu，是否爲1910年麥巴來隘勇線推進時被脅迫去勸降梅嘎浪總頭目的那位「小頭目」，因資訊不足無法比對。毋庸置疑的是，Wacch頭目因爲做過「嚮導蕃」的陳年往事，爲他引來了殺身之禍，且制裁者是同宗、該社遷徙前祖社的塔克南社族人，推測爲無法被認同的異己行爲在部落內引來審判。這是該訊息重要之處。

吉野臺，是一個紀念歷史，又積極去歷史的紀念空間。它被期許發揮美化統治、柔化仇恨、召喚認同等功能，但當地人不斷用另一種刻寫——馘首，向殖民者「回話」，製造「腥記憶」。在警戒所透過報紙印刷宣傳紙上部落的同時，治安事件卻不如人意地揭露當地人的畸行異狀。至少在1920年代初期，梅嘎浪地方不論在報導上或現實中，都不摩登也不平和。殖民飛地之外仍是異質的空間，是認同分歧的、暗默敵對的、他者的世界。

綜合內橫屏山警戒所發布的統計資料、腦工遇害事件、馬胎頭目遭族人制裁事件，1917年到1920年間，梅嘎浪警戒區已有泰雅族、日本人、漢人（客家爲主），三種居民群體，內含外族女性如日警夫人、製腦的客家女性等。粗估製腦會社工人、警力、雇員，約占梅嘎浪地方總人口（部落人口392人，非居民人口246人）的38.6%。誰佔據本土地方，在他民族的生存領域開拓異質空間，社會階序如何？答案是清楚的。襲殺日警及腦丁的泰雅族少數者逃亡奧山，不願進入線外。他們挑戰殖民者法律，以身試法，宣示他們在多族群社區變動成形的過程中的不適與受迫。

27 人名之日文拼音依序爲：ユーミン バイホ、ワセチ ウラス。

十年後，時移事往，櫻林綴滿山頭。在報紙的長期推波助瀾下，吉野臺有一個更親切的名字——櫻山。1927年6月，「全臺八景十二勝票選」在臺灣日日新報社主辦下熱鬧展開。新竹州祭出的王牌，有角板山、五指山、獅頭山和內橫屏山（〈作者不詳〉1927/06/13）。十年人工打造的吉野臺，借助磅礴山景形成高人氣，緊迫在昔日全淡八景之後。不料在最後關頭，新竹州宣布內橫屏山棄權，為此報紙上還特別加以說明：

內橫屏山的警官駐在所在理蕃上已無需保持警戒狀態，且想更進一步往深山蕃地進行撫育，如此則在此植櫻照顧就變成一件麻煩的事。不過，由於所栽之櫻是紀念御大典的，因此將會設置永久設施加以保存。（〈作者不詳〉1927/09/05）

內橫屏警官駐在所的施政考量，似乎是取捨關鍵。在內橫屏警戒線日益平穩，將裁減駐警點的當下，駐在所擔心入選八景以後，員警要登行到九百多公尺的廢所去補植、養護，徒增負擔。比對《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可知，該駐在所已於1924年遷下到錦屏溪河階地，稍後教育所也下移到駐在所旁邊，形成現在梅花派出所、梅花國小毗鄰的部落中心地。吉野臺雖不再是行政平臺，且與八景十二勝失之交臂，但反而於1933年列入「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保存項目。

這場棄權風波，意外透露了在內橫屏山頂種植櫻花這件事的麻煩程度。1927年駐在所不再增植以後，十年後《竹東郡要覽》介紹「州下唯一櫻的名所，內橫屏山的櫻花」時，胸徑一尺以上的成木只剩400多棵。由此推知，草創期3,500棵的櫻木並未全數茁壯。

棄權風波也印證了植櫻紀念措施的隨機性與政治性，以及櫻山紀念空間的戰略性質。「御大典」被當作櫻山的緣起宣告，後續報導、地方誌重複銘刻，彷彿在1912年大正天年以前此地「固無史也」。御大典，是1912年李崧山隘勇線完成、尖石前山納入治理的換喻。被用來置換赤裸的國家暴力，遮蔽當地民族未癒的傷口。記憶的換喻，不是誤用，是刻意使用。從真實的交鋒到御大典紀念空間，從傷死流離到櫻花雪及忠魂碑。記憶空間、櫻木和碑塔，是一種興建，一種投資，一種全面的掌握。征服者的記憶被正統化、集體化、制度化，成為文化記憶的內容。櫻花基於大義名分種植，又基於另一個大義名分停種。紀念空間中的基本元素不變（御大典

紀念、忠魂碑、殉職人員墳墓），但主宰和營運的機構（駐在所、教育所、醫療所）卻隨政略需求，或解散或遷移。

變中不易的是，從討剿後的紀念，到深入後山撫育前的棄用，始終具有連貫性，那就是——「除了理蕃，還是理蕃」。作為族群治理操作一環而製造的這個紀念場所，在擾抗事件減少、象徵權力的起源大正天皇駕崩後，不再那麼重要。但這反倒使這個空間正式獲得了「官定史蹟名勝」的身分，在地方政府出版物（州、郡要覽）中被逐年介紹。

史蹟名勝身分制度化以後，使得櫻山雖未參與八景十二勝角逐，也絲毫不損其作為櫻花名所的正當性和魅力。然而，不可忽略的是，1927年以後官廳在記憶場所、物件和符號論述上，投資的減少，使得象徵資本停留在御大典史蹟，無法像其他八景十二勝等大衆文化景點，開拓新的場所性質和轉喻資源。場所記憶侷限於政治層面的結果，不僅在天皇更迭後減損想像的資本，在戰後政權轉移時更快速衰退。

六、櫻花謝了，梅花開：從殖民爪痕中解放梅花村的集體記憶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說過：集體記憶必定生成於某種參考框架中。「框架（Cadres）構成並鞏固記憶，記憶的主體是單個的人，但他是受制於組織其回憶的框架。因此被一個人或一個社會忘記的，就恰好是那些在當下已經不再擁有參照框架的東西。」（諾哈2012: 28-29）吉野臺，是官廳主導的跨族群新集體記憶的生產空間，以天皇政權和花下忠魂為參考框架，召喚梅嘎蕩群形成國家領土想像，以及對警察治理的服從。四社居民雖通過參與警戒區的殖民治理而形成個體記憶、溝通記憶、集體記憶，但殖民瓦解、交往中斷及參照框架的消失，便導致遺忘。

櫻花謝了，梅花開。1945年以後的臺灣各大報，吉野臺或櫻山都沒有被提起。除了被改稱為錦屏觀櫻，列入新竹縣八景十二勝外，鮮少被報導，²⁸之後更因林務局造林砍伐，或土地轉作他用，導致這個景點徹底消

28 經筆者查詢《臺灣新聞智慧網》，「錦屏觀櫻」僅在2000年以後出現五次報導。但此時所指的，並非梅花村的內橫屏觀櫻，而是尖石鄉公所新設的錦屏村

失。梅嘎菴警戒區的跨族群集體記憶快速破碎、錯位與忘卻，一直到梅花村的休閒農業、部落旅遊出現以後，有關櫻山或隘勇線戰鬥的往事，才由當地人的口傳、有心人的記錄，進入大眾視野。

較早重返櫻山探索這段歷史的，是新竹地區的生態團體和跑步愛好者，這也反映了此地的輕旅行傳統。2007年，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來到這個歷史舊址走踏。當地農場經營者兼部落解說員的巴魯先生，為他們導覽了今日已經看不見的景觀：「由於日本大正天皇曾來此巡視，因此梅嘎菴古道又稱為『太子步道』。步道的尾端是原『內橫屏山教育所』的小學遺址。」我們可藉此訊息看見：地勢特徵相當符合，只是忠魂碑早就不知去向，蒼涼的遺塚已是當地人口中的「亂石塚」，比較特別的還有巴魯說出了日文文獻上未見記載的——防空洞和觀景亭。

駐在所遺址旁附近有一處亂石塚，約葬有日軍士兵十人。砲臺遺址處原是巨木林區，光復以後所有大樹便被砍伐殆盡。防空洞的入口地形低窪隱密，原設有一座木橋。當日軍躲入防空洞後，即將木橋收入洞中，便可阻斷通路，以石壁天險為屏障。涼亭原建於一處平坦的石壁基地，視野開闊，清晰可見油羅溪拖迤而去，內灣、橫山、尖石、新樂、嘉樂等地盡收眼底。²⁹

休閒農業帶來了第一波的地方知識重整，內橫屏山頂率先成為「被喚醒的空間」，櫻山是梅花村人對外自我表述的場所，有著回憶的具體時間，也有具體物件。這一段集體記憶表述，宣告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記憶點——族人也曾對佔盡優勢的日本警察攻打和包圍。

本地族人擔綱的部落景點解說，是一種口傳文類。這種集體記憶的實踐形式，翻轉了官方記憶中真實與想像的關係與視角。詮釋權回覆後，儘管許多內容已經剝落，也可能為再次的曲解誤記，但詮釋空間打開了歷史想像的入口，土地上的遺痕為部落記憶提供了真實依據，歷史視野也有機會溯越到官廳植花改寫以前的抵抗時期，增加了召喚集體記憶的更多可能。

2013年，又有一批重踏櫻山路線的訪客。這是一群環山長跑者，途經

「那羅櫻花文學步道」。

29 鄭漪芳、林秋玫。2007/07/17。〈走入梅花部落，梅嘎菴古道探勘〉，《PeoPo 公民新聞》。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opo.org/news/3497> on Jul. 20, 2021.

日治時期O型路線，在尖石—梅嘎蒨—上坪—北埔進行團練。他們在網誌上歸納的梅嘎蒨古道的歷史，大要如下：1909年日本人在內橫屏山設隘勇線，並施放研發的氣球炸彈。1911年李嶼山事件發生時，馬里光部落要求梅嘎蒨部落支援抗日，故日警在內橫屏山架設山砲與駐在所監視。此事過後多年，山地為迎接皇太子親臨積極營造，1914年角板山完成貴賓館（後稱太子賓館），內橫屏山也種滿櫻花。1923年裕仁太子「行啟臺灣」，因行程緊湊未能親臨，但特派東宮侍從甘露寺伯爵代理「御巡」，先視察角板山，次日抵達內橫屏山。後世便將他由內灣進入的這段櫻花夾道路線，稱為太子步道或梅嘎蒨古道。³⁰

當代在地人口傳的敘事，與臺灣日日新報社以蕃地外部的日文讀者為對象的「主敘事」不同。當地人在「主敘事」的吉野臺據點之外，衍生了梅嘎蒨櫻花古道的「補充敘事」，反映了地方人的記憶和欲望。兩者有主副層級，但看似從屬而破碎的部落記憶也有解構主記憶的力道。譬如，當地人道出日警被族人反攻時躲避的防空洞。又譬如，氣球炸彈（Balloon bombs）雖為二戰時日本人才研發出來的武器，但反映了當地人遭受砲擊的記憶。最後一點，甘露寺受長雖曾於1923年5月參訪角板山貴賓館，但並未造訪內橫屏山。但是當地人傳講天皇、太子或甘露寺來過的說法不斷，被臺灣原住民族委員會建置的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採記，也被觀光局支助、鄉公所最新發行的地方旅行書列入記載（戚文芬2020: 93）。這些記憶／誤記，反映內橫屏山、櫻山、櫻花在族人心中濃厚的政治指涉，以及他們對尖石最早的政經中心的自信和持續的欲望——梅嘎蒨社，在北臺山地中僅次於角板山的地位。

在族人聚會的公開場合，在出版發行的地方誌上，當地人又如何談論這段歷史呢？尖石鄉誌也曾記載梅花村耆老陳光松（Sangas Tahos）牧師的口述。1945年教育所畢業的陳光松牧師，是霧社事件後出生的世代，他對於從櫻山山頂遷下的警官駐在所、教育所等，如數家珍。他說教育所創設

30 大同。2013/07/26。〈內灣 尖石 梅花 花園 上坪 大山背 團練〉，《Xuite 日誌》。Retrieved from: https://blog.xuite.net/shanghua_tsai.tw/twblog1/125699000 on Jul. 20, 2021.

時，學生，包括他的父親Tahos Nomin，共有12人，成1個班，設教師1人。警戒所設在接近山頂的高地，旁邊就是教育所，平臺距離下方部落還有段路程。1929年校址下移，1940年學生數最多時有100人（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編2009: 584, 603）。³¹

官方透過吉野臺空間與相關設施的投資，創造認同想像的契機，和民間社會建立新感情，對次生代有一定的影響。陳牧師對於他幼年身處的大梅嘎蒞社區生活抱持肯定：

日本人來了以後原鄉部落逐漸穩定，也改變過去以燒墾游耕的生活型態。族人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之下，種植梧桐樹、苧麻、蓮草賣給日人或漢人，將所得買油、鹽、牛、豬等日用物品及家畜，部落進入買賣交易的時代。因為泰雅族只在秋天到隔年的二至三月打獵，每年三到九月動物的繁殖期不會去打獵，所以生活很缺肉品，水田定耕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施政項目，族人開始努力開墾……，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業生活，幾乎沒有一個閒人，部落也很少紛爭。（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編2009: 715）

不過，陳牧師在2019年的「部落願景烤火論壇」中，也曾公開傳承部落遭遇討伐的記憶。他的言談未被記錄下來，但參加活動的青年劉書亞（Botu Isaw）印象深刻地說：「日本人的欺壓跟手段，透過部落之間的仇恨關係」，「雖然耆老是用講的，可是我會去想像那個畫面。對我們而言，我們在課本上所學跟著老親自講是有差的。」³²九十多歲的耆老打動孫輩青年的正是——梅嘎蒞社殘存在梅花村的集體記憶。

內橫屏山梅嘎蒞群被討伐的集體記憶，屬性上是溝通記憶，若沒有其它有助於記憶保存的框架和載體，這一代青年可能就是這個集體記憶的最後世代。事隔四代，溝通記憶的內容只剩下大略概念，但倖存的冰山一角，卻是最痛的記憶——自己人對付自己人。

當地人回憶最多、最肯定的，是殖民現代性的部分；回憶最少，最難啟

31 1945年教育所停辦，1946年6月國府設校，更名為尖石國民學校，校長何阿煌。1948年改名為梅花國民學校。鄉誌中另記載：1943年集合柿山、新興教育所之後，共有6班，268名學生（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編2009: 715）。

32 蔣淮薇、張治平。2019/09/22。〈泰雅耆老陳光松 訴說梅嘎蒞部落史地〉，《原視新聞》。Retrieved from: <http://titv.ipcf.org.tw/news-50689> on Jul. 20, 2021.

齒的是以蕃治蕃下的內部撕裂。新竹前進隊和報社以日文連年推播的尖石前山討伐信息，以無視當地人存在的姿態發訊，在其它族群不敢置喙的情況下片面論述，其報導帶有三種特徵：1. 營造蕃地險惡環境，突顯討伐隊英勇形象；2. 指名道姓羅列「兇蕃」人名，點名不合作部落和傳統領袖名稱；3. 宣揚前進隊戰功，銘記協力部落和協力者人名。主流媒體的傳播，使傳統領域喪失的沉痛記憶，在山地國有化的殖民史中被消音。梅嘎漢四社族人，被分類為拒絕歸順的「兇蕃」、人數最多的沉默他者，以及少數嚮導人。時移事往以後，當地人如何面對這些不忍卒睹的記憶和文獻，以及充滿矛盾的族群關係或人與人的關係？除了緘默不說、接受再覆蓋，就是刻意遺忘吧？

2013年「PeoPo公民新聞」訪問村民：國民政府治理後，要求村落取漢名，你們當時為什麼要叫「梅花村」呢？以下試舉當地人的三種回答：

「梅嘎漢，光復前稱為櫻花村，光復後改為梅花村，但是杉木造林政策下，現在幾乎沒有梅花。」

「聽老人家在講，以前的老人家不喜歡日本人，光復以後日本人走掉之後，他們就把他們的櫻花全部砍掉，砍掉之後就說『沒有花了！沒有花了！』對啊！這是真實的故事，所以現在才叫『梅花』。」

「我們梅花村一開始命名就是櫻花村，因為我們本來就有櫻花。但是櫻花是日本的國花，當然日本已經離開臺灣了。我們上面核定的結果，就說你們如果那麼喜歡花的話，就把花留下來，但是櫻花這個要改掉。我們也是為了要迎合國民政府的國花梅花，就列入我們村的名字。所以說梅花村就是這樣來的。」³³

統整櫻花變梅花的主要原因包括：1. 日本走掉那時的老人家不喜歡日本人，就把他們全部砍掉；2.（林務局）杉木造林政策，把櫻花砍掉。3. 改朝換代，村名必須配合國策。村民記憶中的前兩者是物質層面上被砍掉的櫻花，第三個則是象徵層面上必須自我清洗的政治符號。在土地所有權的占有、意象的清洗與重抹後，梅花村再次搖身一變，變成「沒有花的，梅花村」。錦屏觀櫻的勝景，也隨木倒花落走入歷史，但在鄉公所的記憶再造下，錦屏村卻再次開花。

33 阿Ben。2013/09/27。〈沒花的 梅花村〉，《PeoPo公民新聞》。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opo.org/news/218339> on Jul. 20, 2021.

綜上可見，內橫屏山梅嘎蒞群抵抗隘勇線推進的集體記憶，在梅花村族人心中已微乎其微。它再次浮現是在2000年以後，鄉公所推動休閒農業、部落旅遊的歷史語境下，回應與對話的群眾最初是外來遊客；其後的二十年，基於族群自我教育、地方創生、人才培育等需求，鄉公所仰賴耆老進行代際傳播，逐漸加深挖掘（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編2009: 739）。³⁴但有關這個「消失／轉移的勝景」的溝通記憶，其傳述能量已幾近極限（阿斯曼2015: 50-51）。³⁵下一個召喚記憶出土的框架與契機，或許是尖石鄉方興未艾的泰雅族民族教育文化課程。民族本位的教育資源需求，如何影響梅花村和尖石鄉的集體記憶形塑，值得期待與觀察。

七、結論

尖石前山泰雅族被隘勇線討伐的記憶，在五年理蕃計畫結束後，遭遇第一度的壓抑。1915年以後，梅嘎蒞警戒區形成一個多族群社區，統治階層的記憶政治操作，為當地植入環繞天皇國家的集體記憶。1945年梅嘎蒞地方經歷戒嚴體制等意識形態控制，殖民初期的抵抗記憶遭受二度壓抑。在橫屏觀勝景的生產過程中，多種不同媒介對於記憶的內容與形象都帶來影響。其中，在文字、圖像、發行量、周期性上，形塑力最強的是報紙。報導敘事中毫不掩飾地描述族群操作方法，乃至將弱勢者當作人質加以脅迫。殖民者忽略暴力性的自我，是新竹推隘新聞記事的本質。官方祭出的「以蕃治蕃」，招來亡命山林者的「以牙還牙」。官廳掌握第一時間的新聞發布權，也擁有事後歷史的編纂權，乍看之下勝利者的記憶，決定了梅嘎蒞警戒區的集體記憶。然而，在官方話語的縫隙，我們看見小眾起義的抵抗和這種作為的價值宣告。弑警逃亡者，從文明邊陲逃回野性綠林，以法外空間對抗警戒區（殖民者的象徵），形成抵抗的姿態。他們在

34 《新竹縣尖石鄉鄉誌（初編）》編纂期間也遭遇史蹟調查不易等困難，而倚耆老幫助。

35 揚·阿斯曼（Jan Assmann）夫婦在1980年代提出文化記憶概念，指那些超越日常的長時間記憶，包括神話傳說、集體舞蹈和慶典等，並用來區隔那些記憶長度至多三、四個世代的溝通記憶。

界外自我的棲息空間，實踐族群主體性，那是身體的空間，也是泰雅族習俗與律法（Gaga'）的場域。逃亡者的空間與警官駐在所管轄空間對峙，是地方傳統與統治權威的對抗。

內橫屏山頭，從殺伐之地變成風景名勝，官廳、駐在所與登山團體聯手的新聞產製居功厥偉。各種文化工具壓抑部落抵抗記憶的橫向傳播，併用同化教育之國家機器，干擾記憶的世代傳承。重大歷史事件被櫻花地景、休閒意象轉移，這就是「內橫屏觀櫻」誕生、流行、成為官定史蹟的語境。但是，遮蔽有其終點，梅嘎蒨社的記憶仍有潛力在村人的當代實作中，獲得新的集體記憶與歷史動能。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Assmann, Jan (揚·阿斯曼) 著，金壽福 (Jin, Shou-Fu)、黃曉晨 (Huang, Xiao-Chen) 譯。2015。《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Wenhua jiyi zaoqi gaoji wenhua zhong de wenzi huiyi he zhengzhi shenfe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北京 (Pek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Nora, Pierre (皮耶·諾哈) 編，戴麗娟 (Dai, Li-Jyuan) 譯。2012。《記憶所繫之處》*Jiyi suoji zhichu* [*Les Lieux. de memoire*]。臺北 (Taipei)：行人 (flâneur culture Lab)。
- 林一宏 (Lin, Yi-Hung)。2007。〈從隘勇線到駐在所：日治時期李嶼山地區治理蕃設施之變遷〉“Cong aiyongxian dao zhuzaisuo: rizhishi qi lidongshan diqu lifan sheshi zhi bianqian” [From Barrier Defense Lines to Stationary Offices: The Evolution of Managing the Aborigines in the Mt. Li-tung Are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臺灣史研究》*Taiwanshi yanjiu* [*Research of Taiwan History*] 14(1): 71-137。
- 林玫君 (Lin, Mei-Chun)。2003。《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Riben diguo zhuyi xia de taiwan dengshan huodong*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Imperialism*]。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tiyu xuexi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林修澈 (Lin, Siou-Che)。2018。《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Taiwan yuanzhuminzu buluo shidian [Encyclopedia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新北 (New Taipei)：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倪再沁 (Ni, Tsai-Chin)。2002。《石川欽一郎：日本殖民帝國的美術教育者，創造臺灣異己意象的水彩畫家》*Shichuan qinyilang: riben zhimin diguo de meishu jiaoyuzhe, chuangzao taiwan yiji yixiang de shuicai huajia [Kinichiro Ishikawa: the Art Educator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the Watercolorist Who Created the Taiwanese Exotic Image]*。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 (donghai daxue meishu xuexi shuoshi lunwen) [M.D.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Fine Arts, TungHai University]。

張夢軒 (Chang, Meng-Hsuan)。2017。《綏撫、監控到自治——日治到戰後前期山地交易的制度形成與變遷》*Sui fu jiankong dao zizhi: rizhi dao zhanhou qianqi shandi jiaoyi de zhidu xingcheng yu bianqian [Appeasement, Monitoring to Autonomy: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Mountain Trading from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ostwar Period]*。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taiwanshi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D.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陳培桂 (Chen, Pei-Guei)。1993 (1870)。《淡水廳志》*Danshui ting zhi [The Annals of Tansui Tien]*。南投 (Nantou)：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陳朝龍 (Chen, Chao-Long) 編。1999 (1888)。《新竹縣採訪冊》*Xinzhuxian caifang ce [Investigations of HsinChu County]*。南投 (Nantou)：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戚文芬 (Ci, Wun-Fen)。2020。《遠離塵囂，悠遊尖石：看見臺灣最經典的山城》*Yuanli chenxiao, youyou jianshi: kanjian taiwan zui jingdian de shancheng [Far from the Urban, Explore Jianshi: Discover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ountain Valley of Taiwan]*。新竹 (Hsinchu)：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Hsinchu County Jianshi Township Office)。

黃奇烈 (Huang, Ci-Lie)。1957。《臺灣省新竹縣志稿 卷三 土地志 (3) 物產、名勝古蹟》*Taiwansheng xinzhuxianzhigao juansan tudizhi (3) wuchan mingsheng guji [County Chronicle of Hsinchu, Taiwan Province: Land Chronicle 3: Products, Historic Sites]*。新竹 (Hsinchu)：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ommission of Hsinchu)。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 (Hsinchu County Jianshi Township Office) 編。2009。《新竹縣尖石鄉鄉誌 (初編)》*Xinzhuxian jianshixiang xiangzhi (chubian) [The Chronicle of Jianshi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First Edition)]*。新竹 (Hsinchu)：尖石鄉公所 (Jianshi Township Office)。

- 溫振華 (Wun, Jhen-Hua)。2014。〈日治時期原住民部落的交易所〉“Rizhi shiqi yuanzhumin buluo de jiaoyisuo” [The Transaction Institution of Indigenous Tribes from Japanese Colonial Era]，《臺灣學通訊》*Taiwanxue tongxun* [Newsletter of Taiwan Studies] 28: 22-23。
- 廖守臣 (Liao, Shou-Chen)。1984。《泰雅族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Taiyazu wenhua: buluo qianxi yu tuozhan* [The Atayalic Culture: the Trace and Expansion of Tribes]，臺北 (Taipai)：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 (Department of Tourism, Shih-Hsin University)。
- 劉澤民 (Liou, Ze-Min)。2017。〈「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碑」與馬里科灣原住民抗日事蹟探討〉“Gu xinzhuang xuncha wushilan zhanghui wai shi ming zhi bei' yu malikewan yuanzhumin kangri shiji tantao” [Discussion of The Tablet Named after Policeman Igarasi Nagateru and Others, and the Anti-Japan Movements of Maricowan Aboriginal Atayal Tribe]，《臺灣文獻》*Taiwan wenxian* [Taiwan Historica] 68(3): 60-72。
- 鄭安晞 (Cheng, An Si)。2011。《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 (1895-1920)》*Rizhi shiqi fandi aiyongxian de tuijin yu bianqian (1895-1920)* [Advancements and Changes on Defense Line of Aboriginal Area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20)]。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zhengzhi daxue minzu xue xi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顏娟英 (Yen, Chuan-Ying)。2000。〈近代臺灣風景觀的建構〉“Jindai taiwan fengjingguan de jiangou” [The Vision of Landscape in the Early Modern Taiwanese Art]，《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Guoli taiwan daxue meisushu yanjiu jikan*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9:179-206, 240。

二、日文書目

- 〈作者不詳〉。1903/11/13。“上坪部内の蕃情”〈上坪部内の蕃情〉，《臺灣日日新報》。
- 。1909/08/12。“新竹前進隊情報 內橫屏山占領後の狀況”〈新竹前進隊情報 內橫屏山占領後の狀況〉，《臺灣日日新報》。
- 。1917/04/06。“內橫屏山の吉野櫻”〈內橫屏山の吉野櫻〉，《臺灣日日新報》。
- 。1917/10/30。〈本島蕃地視察 活動寫真技師〉，《臺灣日日新報》。
- 。1917/12/06。“内地櫻の移植 內橫屏山の吉野臺”〈内地櫻の移植 內橫屏山の吉野臺〉，《臺灣日日新報》。

- 。1917/12/06。〈内横屏山警戒所 蕃人物産其他〉，《臺灣日日新報》。
- 。1919/02/10。“内横屏の花信 蕃地櫻散つて内地櫻”〈内横屏的花訊 蕃地正盛開著内地的櫻花〉，《臺灣日日新報》。
- 。1919/10/17。“蕃情と新事業地”〈蕃情和新事業地〉，《臺灣日日新報》。
- 。1920/03/14。〈母子同遭蕃害〉，《臺灣日日新報》。
- 。1920/05/23。“兇蕃の覆讎 マト工社頭目誅首さる”〈兇蕃的復仇 馬胎社頭目剛被誅首〉，《臺灣日日新報》。
- 。1927/04/12。“内横屏山の山頂で舉行された 山嶽會發會式内横屏山へ”〈山嶽會發會式在内横屏山的山頂舉行〉，《臺灣日日新報》。
- 。1927/06/13。〈竹州努力 推薦勝景〉，《臺灣日日新報》。
- 。1927/08/27。“臺灣八景決定 二十五日鐵道ホテルに於ける 最後の審査委員會で 同時に別格二景 及十二勝も決る”〈台湾八景決定 二十五日於鐵道飯店 最後的審査委員會中 並同時決定特別二景 以及十二勝地〉，《臺灣日日新報》。
- 。1927/09/05。“クチナシ”〈梔子花〉，《臺灣日日新報》。
- 。1928/01/24。“花見季節 島内の花の名所”〈賞花季節 島内花的名勝〉，《臺灣日日新報》。
- 。1937。《新竹州要覽（昭和12年版）》。新竹：新竹州。
- 。1937/04/10。“内横屏山へ 觀櫻ハイク 今が見ごろ”〈往内横屏山 賞櫻健行 當今正是花季〉，《臺灣日日新報》。
- 。1938/04/08a。“山嶽會員が櫻見物”〈山嶽會員賞櫻〉，《臺灣日日新報》。
- 。1938/04/08b。“内横屏山へ 觀櫻登山”〈去内横屏山賞櫻登山〉，《臺灣日日新報》。
- 。1938/12/08。“竹東／乗合バス増發”〈竹東增開旅遊巴士〉，《臺灣日日新報》。
- 。1940。《新竹州要覽（昭和15年版）》。新竹：新竹州。
- 竹塹道人。1921/04/21。〈屏山櫻〉，《臺灣日日新報》。
- 竹東郡役所編。1937。《竹東郡勢要覽》，新竹廳：竹東郡役所。

李承機。2003。“植民地新聞としての《臺灣日日新報》論—「御用性」と「資本主義性」のはざま”〈論作為植民地新聞的《臺灣日日新報》—「御用性」與「資本主義性」之間〉，植民地文化研究《植民地文化研究》第2期，頁169-181。

村上特派員。1910/05/12a。“マ社の投誠”〈マ社の投誠〉，《臺灣日日新報》。

——。1910/05/12b。〈隘勇線前進 第四報〉，《臺灣日日新報》。

——。1910/05/15。〈隘勇線前進 第七報〉，《臺灣日日新報》。

国策記録映画（國策記録映畫）。2008（1940）。〈南進臺灣〉，《片格轉動間的臺灣顯影》。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三、英文書目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Britain: Routledge.